

那些优秀的台湾作家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意识，他们无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铲除，用作品对抗殖民者并希望唤起台湾民众……

暗夜里的台湾文学之光

陈键兴 孟昭丽

当下，在台湾的书店里要找到他们的作品并不容易，连他们的名字也已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然而，回顾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以他们为代表的台湾优秀作家闪耀的民族精神之光，应当被重温，被纪念。

在新竹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吕正惠等学者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那长达半世纪的时代暗夜里台湾最亮的文学“星光”。

赖和

赖和，台湾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台湾被清廷割让日本。

台北医学校毕业后，赖和就职于嘉义医院，因无法容忍日本医生和台湾医生间的不平等对待，回到故乡开设“赖和医院”。1918年，赖和前往厦门，供职于鼓浪屿上的博爱医院。在大陆期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台，参与领导台湾文学改造。

发轫于19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斗争和思想启蒙运动，而赖和正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与主导者，加上他的医师身份，因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

赖和留下的宝贵文学财富，体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诸多方面，许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其创作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最长的一首诗《南国哀歌》，为纪念雾社抗日起义所写，揭发、谴责殖民者以先进武器屠杀少数民族同胞：“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赖和曾两次被捕入狱，年不过50离世。

杨逵

杨逵，1906年生于台南，1924年赴日留学，1927年返台参加组织农民运动，1935年创办《台湾新文学》月刊。因为登载

许多抗日文学作品，杨逵数次被捕，在日据时期共坐牢8年。

1915年，台湾发生西来庵武装抗日事件，被捕台胞多达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处死刑。年幼的杨逵亲睹日军镇压起义的炮车从家门口经过，心灵被强烈震撼。后来，他读到日本人所写的《台湾匪志》，其中包括对这一事件的歪曲记载，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后来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型态抗议，自然就成为了我最关心的主题。”

1932年至1934年，创作了第一部小说《送报夫》。“以简洁而有力的情节，表现了台湾中下层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走投无路的情景。”吕正惠说。杨逵另一部代表作是《横范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本地的封建势力联手压迫农民。吕正惠认为：“杨逵具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锐的现实感受，他的创作总是希望掌握时代与社会的大关键，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吕赫若

吕赫若，1914年生于台中一个大户人家，从小成绩优异，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次年即以《牛车》成为台湾文学界瞩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陆文坛关注。吕赫若还曾赴日本学习声乐，在文艺界兼具音乐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

吕正惠认为，吕赫若在《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里，描写了台湾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在《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中，他以新思想为基础，剖析了女性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批判和抗议精神。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更加严厉、高压，台湾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到更为严苛的限制，吕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击。“从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文艺政策立场来看，吕

赫若着力刻画台湾社会的腐朽、黑暗，对‘皇民化’问题几乎不屑一顾，是非常有问题的。”吕正惠说。

吕赫若之子吕芳雄回忆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父亲和所有台湾民众一样，欢欣鼓舞，十分兴奋。之后，吕赫若参加中共地下工作组织，1951年遇难，年仅37岁。吕芳雄说：“我的父亲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敌对理想社会，他的道路终究是对的。”

吴浊流

《亚细亚的孤儿》写于1943—1945年间，正值太平洋战争后期。在那个动荡、恐怖的年代，吴浊流躲在屋里，偷偷地写作这本小说。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发疯”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墙上写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摧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横暴塞威奈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

吴浊流曾回忆自己在日据时代担任教职，无法忍受日籍校长和教师对台湾教师的长期歧视，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蛮横。吕正惠说，有“台独”人士企图歪曲吴浊流及其作品，但他们的解释完全讲不通。只要读读吴浊流的回忆录《无花果》，就可明了他的心迹。

“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其核心都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吕正惠说，那些优秀的台湾作家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意识，他们无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铲除，用作品对抗殖民者并希望唤起台湾民众。

除了赖和、杨逵、吕赫若、吴浊流之外，还有许多历经那个苦难岁月的台湾作家以笔为剑，要刺穿那暗夜、点亮苍穹，他们都是“台湾的良心”。吕正惠说：“这些美好的心灵，不应被今天的人们淡忘，更不容别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见他们！”

(据新华社台北电)

抓拍香港

海绵城市

香港每年平均降雨量达2200毫米，是太平洋地区降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为减低水患影响，香港自1989年以来投入240亿港元提升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建排水隧道，保护湿地，在合适的新建政府建筑物工程项目中引入屋顶绿化设计，现在香港的绿化覆盖率达70%，有效涵养了降雨。 吕小炜摄



每年的10月31日，英语国家的人们都要举办万圣之夜活动，这一源自天主教的传统民俗活动近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时尚，受到追捧。本周，台湾南开大学教师赵哲圣投书《中国时报》提出，万圣夜的流行自然源于文化的共享，但相较之下，我们自己的节日与民俗却受到冷落，在年轻一辈中产生断层，这种现象折射出文化流失的隐忧。文章摘发如下：

声音



万圣节的迷思

西方东传的万圣节，这些年来成为许多小朋友与年轻人装鬼弄神的节日。未来几天，我们会碰到许多喊着“Trick-or-treat不给糖就捣蛋”的双语幼儿园小孩穿梭玩耍在街头。

为什么一个西方的习俗，我们的孩子却如此熟悉与投入？这是文化全球化的反射，也是英语文化从人（外语老师）、机构（双语幼儿园与补习班）到西方媒体所主导的传播。我忧虑，这将把我们带往一个“文化英语化”的失衡境地。

西方节日通过媒体铺陈和嘉年华似的包装，呈现出时尚、主流的气氛。孩子们尚处于对自己的生活区域、自有节日懵懂无知的启蒙阶段，因大量外来信息和商家店铺提供的装饰道具，变成“皮下注射”传播理论中的被注射体，没有抗体地接受。小孩如同海绵，在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时，自己文化中的如农历新年、光复节等只成了放假的标志，因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和教育已省略了这些本地节日与民俗的文化建构，等同于自我删除。

网络正在创造数字世界的搜寻思维，演变为信息与商业的交易机器。网络会记忆每个人的搜寻记录，并据此提供过滤后的推荐新闻或采购列表，这股无形控制力深化至每个年龄层和不同的工作群体。以往传统媒体时代西方所主导的节日讯息已经偏重，而新媒体时代的网民在鼠标纪录、手机点选、消费个资、社群分享等无声监控算下，更方便体会与认同西方节日。但这种认同极易陷入紧随流行的消费至上，令节日与民俗活动成为失根的消费为本，更何况，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消蚀了更多自有节日的文化底蕴，最终漂流而不自知。

香港地铁有新规

小夏

本周，香港地铁举行记者会介绍“登记携带较大型乐器试行计划”新规，从下周起，乘客如携带大型乐器搭乘地铁，须预先申请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3年，可上网申请，预计7个工作日完成审核。

新规将试行4个月，然后再视实际执行情况做出调整。港铁表示，绝大部分较大型乐器都可获得许可证带进车站和车厢，但周一到周五早上8时15分至9时15分繁忙时间内，乘客仍不可携带大型乐器进地铁。

港产电动巴士亮相

朴子

香港研发的首部电动巴士本周首次公开亮相，这部历时两年多、研发经费近4000万港元的“香港品牌”电动巴士，充电时间为4小时，满载最高时速70公里，充满电后满载、开空调、不停站最远可行驶380公里。

电动巴士从整体车身设计到车辆的总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均由香港专家研发，电动巴士全长约12米，单层设计，最大载客量75人，具有车身轻、续航能力强、智能化和本地设计四大特色。电动巴士即将展开为期1个月的香港本地路面测试和车辆性能测试，并将于香港“创新科技嘉年华2015”期间展出。

蒋经国故居开旅社惹争议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本周，一则蒋经国故居要建旅社的消息成为台湾社会讨论话题。据称，以蒋经国官邸为中心的“经国七海文化园区”要建一家“学人旅社”，供参加学术研讨活动的学者住宿。消息传出，反对者提出，园区东临台海军事司令部，西接台安全部门，虽然故居人去楼空，但仍属“重地”，现在园区每天下午7时净空关门，如果一旦建旅社，人员活动不好掌握，有“安全”隐患。

园区经营者某基金会解释，旅社并非一般游客可住，只是学者的招待所，供在蒋经国图书馆举办学术活动和在此研究者租用，当初竞争经营权时便有此规划。园区的管理者台北市文化局表示，建旅社的方案尚在审查，还未定案，已经请经营者提供更详细的配套设计。

“经国七海文化园区”包括蒋经国在台北住得最久并在此离世的住所、庭院、蒋经国图书馆及生平事迹陈列馆，位于台北市大直北安路。蒋经国居住了19年的2层小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原为当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官的招待所，故得名“七海”。蒋经国1969年从台北市长安东路迁居至此，一直住到1988年去世。

蒋经国在台北的住所被称为“士林官邸”，蒋经国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不许称自己的住所为“官邸”，此地于是得名“七海寓所”，直至他继承父亲高位，也一直沿用“寓所”的称呼。有趣的是，其后的李登辉

称自己的住所为“大安官邸”，陈水扁称“玉山官邸”，2008年马英九当选领导人后，称住所为“中兴寓所”，“寓所”再次回到台湾的政治舞台。在台湾，除了领导人“官邸”，副领导人也配备“官邸”，2008年，吕秀莲随陈水扁下台，但她把住过的“官邸”已改建成莲花色的“闺阁”，以致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曾婉拒入住，情愿留在自己的家中。

马英九曾经回忆说，他虽然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多年，但直到1987年11月蒋经国去世前2个月，才被召登上“七海寓所”二楼进入蒋经国的卧室，听蒋经国交代工作。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从1982年就已经恶化，他经常在卧室办公，他的卧室兼具办公室和病房功能。虽然留在家中，但他的专车还是按时往返办公室与家中，不给外界“揣测”空间。

1988年，蒋经国在“七海寓所”去世；2004年，他的妻子蒋方良去世。此后，这里人去楼空，日渐破败。陈水扁执政时期，曾有人在报上骂蒋家后人搞特权，仍动用公款和警卫，蒋孝严反击称没有任何一位后人住在“寓所”，如果有公共支出也只是出于对故居的保护。

现在，被规划为文化园区的“七海寓所”成为台北的一处名胜，不定期向公众开放。与“士林官邸”的宫廷风、西洋风不同，“七海寓所”是平实的居家风格，家人照片、木扶手沙发、“大同”牌电饭煲，都是那个时代台北人家的生活写照。蒋经国与蒋方良的卧室都保持了他们离去时的原貌，医疗床、半旧的拖鞋、俄罗斯套娃……据蒋经国的三儿媳蒋方智怡介绍，就连被单、枕巾都是当时的旧物。

园区开放日，记者曾去现场采访，参观的人数之众出乎记者意料，其中有蒋氏旧部，也有普通市民，不少人在参观时对“寓所”的简朴平实肃然起敬，对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起飞、政治解除“戒严”、开放老兵探亲的过往追忆不已。



蒋经国故居“七海寓所”



会客厅



故居内随处可见家庭照片